

网络反腐的符号传播逻辑及其社会整合作用

——以“杨达才事件”为例

张淑华

内容提要 符号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分析工具，对网络反腐现象具有解释力。一段时间以来，网络反腐事件具有符号化传播倾向，并形成了其独特的传播逻辑和巨大的社会整合作用：作为表达技术的符号，能够凸显社会问题和为社会设定公共议题；作为意义生产单位的符号，具有审视和建构社会关系的作用，其对抗性的意义和关系建构构成了网络反腐的外部呈现和内在动力；作为话语权利的符号，以“合法性”评价为手段为社会设定规范，调整社会权力结构；作为危机标志的符号，具有制度催化的作用，敦促网络反腐走向理性和成熟。

关键词 网络反腐 符号 杨达才事件

喻国明在论及微博等新媒体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时说：“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主要不是为我们增加了新的传播平台，而是在改变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改变着社会资源、社会权利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配。所以它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波及到每个人，波及到每个设施，包括制度，包括现有所有规则的深刻的革命。”^[1]网络反腐的革命性意义正在于新媒介所显示出的巨大社会整合作用：不仅体现在通过符号化传播手段对事件意义及其主体关系的整合，还在于更深层次的权力结构整合，甚至包含了文化形式包装下的制度整合期待。

以符号化传播为表征，一段时间以来一系列网络反腐事件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形成了其独特的传播现象和传播逻辑：一是符号成为一种表达的技术，通过“房”、“表”、“车”等物质符号凸显问题，为社会设立公共议题；二是符号作为意义生产单位，具有对社会关系的审视和研判功能，其对抗性的意义和关系建构构成了网络反腐的外部呈现和内在动力；三是符号作为一种话语权利具有监督功能，以“合法性”评价为手段重新为社会设定规范，调整社会权力结构；四是传播中对符号的过度倚重可能会误导公众，造成社会伤害，因而需要好的制度设计防止符号暴力的出现，防止网络反腐沦陷为一场非理性“运动”，符号因此具有制度催化作用。正是网

络反腐事件所呈现出来的符号化传播特征及其运行逻辑促动了符号的社会整合力量。从这一印象（或假设）出发，本文以“杨达才事件”为例，尝试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对网络反腐现象进行具有实证取向的解读。

一、作为分析工具的符号学：理论框架与问题指向的契合

（一）符号学的解释力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

符号学从其创立伊始，到其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等代表性人物，其研究指向多致力于对日常生活的解释。符号学的解释力首先源于符号的遍在性。“符号学家认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以各种符码的方式发送有关我们的信息。”^[2]符号学家的使命就是教授人们如何破译这些规则，了解符号背后的关系和意义，符号学由此被看作“是阐释性科学的王后，是开启万物意义的钥匙”^[3]。符号学的解释力还体现在符号规则的建构和对符号的使用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符号学的两个奠基人——索绪尔认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皮尔斯则把符号区分为图像（Icon）、标志（Index）和象征（Symbol）三个层面，认为图像可以看到，标志可以推演，而象征则必须经过学习^[4]——他们都认为符号物及其意义之间存在距离，这种距离为意义规则的建构，也为解释留下了空间。符号学由此而成为一种分析工具和方法论。

符号学研究的范畴也为具体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技术指导。对符号学代表性成果进行内容归类发现，符号学研究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符号本身——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几乎受到所有研究者的关注；组成符号所依据的符号系统——如翁贝托·埃科对“符号与真相”的探索，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拟像”与“超真实”的讨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生成语法理论”的研究等；符号运作所依存的文化——如罗兰·巴特在《神话》（*Mythologies*）中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内涵的分析，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Strauss）对文本的隐性意义的揭示，詹姆斯·莫纳科（James Monaco）对“隐喻”和“转喻”的分析等。由此，对符号的研究可以遵循从符号认知到关系认知，再到文化探究几个层面，也可以形成具体问题研究的不同切面，为具体问题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看，符号系统产生于符号的选择和组合。索绪尔认为符号有两种组成方式，为了说明符号系统如何发挥作用，他提出了系谱轴（paradigm）和毗邻轴（syntagm）这两个概念作为分析方法^[5]：系谱轴用以解释符号的选择和替换规则，通过选择具有独立性并能与其他词语明确区分的话语单元来表达意义，例如你可以选择“微笑”和“健康”组合在一起表示“心情愉快”，也可以用“疾病”替换“健康”和“微笑”组合在一起表示“坚强”；毗邻轴用以解释符号间的排列和组合规则，通过惯例和规则譬如语法、修辞，将被选用的符号进行组合来表达意义，譬如“微笑”应该出现在

代表喜悦的场合，把它放置在“车祸”背景下就会产生不适感。符号通过这两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并按照一定的规则传达意义和发挥作用。这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也为分析具体问题提供了技术路线启示。

（二）用符号学分析网络反腐现象的现实理据

网络反腐是近年来广受学者关注的新社会现象，学者们从政治、社会、经济等不同视角对其现象、问题、对策等展开多维研究，但符号学视角的研究却鲜有人为。随着近期网络反腐事件“符号化传播”倾向的典型呈现，用符号学强烈的解释性去探寻网络反腐事件传播背后的意义规则、关系呈现和文化背景，从而探究问题实质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价值。

约翰·费思克（John Fiske）把大众传播研究分为两大派别，过程学派（process school）和符号学派（semiotic school）。符号学派关注人类传播活动中意义的生产和交换，把传播看作是一种符号产品，把符号看作传播的形式和物质载体，把符号及符号构成的文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和解释的工具，通过符号去寻找背后隐蔽的意义和关系^[6]。而且，符号和关系作为符号学分析的两个关键概念，也为具体问题的分析设定了议题和路径。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提出：社会和文化现象不仅是物质对象或事件，而且是具有意义的对象或事件，因此构成符号；其次，社会和文化现象不具有本质，而是受关系网的界定^[7]。事物的意义来自于符号，来自于汇聚符号的系统，决定意义的不是事物的具体内容，而是系统所呈现出来的关系。符号所传递的某一信息，要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去理解。因此，系统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所揭示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对意义的产生十分重要，是不可或缺的分析元素。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以网络言论为代表的公众表达常常充满了“符号暴力”，尤其是各种网络公共事件的传播，其符号的选择、使用、生产变得吊诡而充满“异化”色彩，其表层的意义认同危机及其投射出来的阶层分化、利益冲突等深层社会关系越来越集中地呈现于新媒体、全球化冲击下话语权力迁移、符号规则变化这一宏大的叙事背景。而符号学强烈的解释力使它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分母”^[8]，“符号学的方法论已经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完全可以用来分析网络公共事件……可以开辟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学术新视野和新维度”^[9]。符号学的引入为网络反腐事件的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析事件意义及其背后复杂的关系。

二、作为表达技术的符号：为社会设定公共议题

微笑局长、表哥、车叔、房妹、房姐，一系列网络反腐事件中这些看似平常的物质符号与貌似亲切的称呼，却隐藏着汹涌的民意和被结构化的社会情绪，这些符号在事件传播中被首先从完整故事中剥离出来，被“聚焦”，并成为事件的显著标志，具有道具和线索作用，随之通过这一标志来讲述事态发展，揭示利益冲突，构建社会关系，重塑政治文化……符号成为一种表达技巧。通过强调具有鲜明特征的

符号来为社会设定公共议题成为网络反腐事件传播的一个显性特征。

(一) 网络反腐事件的符号化传播倾向

所谓符号化,按照德国学者卡西尔(Erest Cassirer)的说法,“人的活动形式不是被动简单地接受外界的事实给予,而是主动摄取。这里,各个指称之间形式相互关联,构成了异于实在世界的结构,处在这种结构中的具体指称所表述的意义既来源于客观刺激,又来源于结构本身。这就是符号化过程,处在结构中并受制于整体结构的指称形式就是符号”,^[10]人的思维就是一个对符号的挑选、组合和转换的过程,即将世界符号化的过程。具体到新闻事件传播中的符号化,则包含两层意思:表层含义是指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信息与文本通过符号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特别是新闻报道者通过对报道对象的选择和组合、建构关系和赋予意义等手段,利用符号将信息转化为文本;深层含义则强调“化”的抽象性、模式化、简约化的思维框架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作用,更多的是指新闻媒体在新闻制作过程中对符号的过分倚重和简单化使用,导致符号解读过程中出现了意义偏差和价值偏差,多了一层贬义。“媒体从业者以传播简易性和话题吸引力为出发点对某些新闻事件选择性关注和报道,突出符号的偏向使用而忽略情境的综合观测”,会导致“信息的片面化呈现”、“受众价值判断被固化”等负面问题^[11]。热点事件,特别是一段时期以来的网络反腐事件,其贬义的符号化传播倾向非常明显:一是传播过程中全面、客观的传播语境被忽略;二是报道过程中媒体的窄化和简单化操作。在网络背景下,又多了以社会阶层分化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前提的“标签化”传播和对抗式解读。“秒杀”官员、“二奶反腐”、“坑爹一代”等网络流行语和流行词汇对热点事件在符号、关系、意义等方面的形塑和隐喻是符号化传播的集中与典型体现。

(二) “杨达才事件”中的符号化呈现及议题设置^[12]

杨达才“一笑倾程”的落马过程就是一个符号被选择性使用和解读的过程,也是不同社会阶层利用符号进行交锋和斗争的过程,符号对抗的背后是符号权力的斗争。“杨达才事件”在媒体中的呈现及其符号传播演进可以用表1作简单展示。

这一事件的议题设置源于网民对“微笑”的质疑,质疑、验证、定性构成了故事讲述的基本脉络,对真相的探究是传播的动力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的眼球被集中吸引到笑、表、眼镜等表情和物质符号上,“表”和其他的辅助性物质符号不仅超越了其“能指”的时间工具等含义而化身为质疑和求证腐败最有力的标志性符号,而且成为整个故事讲述的道具和叙述方式,成为关系和意义构建的技巧,完整的背景呈现和故事链条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只有碎片化的单个符号和单一的问题主题带动着故事往前发展。虽然在讲述中也兼顾了公平原则,给了杨达才“抗辩”的机会,但是表述过程中的窄化、标签化和先验性等符号化特征依然清晰可见。基于网民和公众固有意识形态的符号选择,不仅带动了议题的变化,反过来也带动着意义和关系的转换,在符号和关系的互动中完成了符号意义和关系的重新解

读和再次认证,强化了对关系的认知。这从后文事件的议题变迁中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

表1 “杨达才事件”的媒介呈现和符号使用情况

出现时间	媒介呈现		符号使用	
	媒体	内容	能指	所指
8月26日 16:35	网友@ JadeCong 发微博, 网友开始人肉搜索	微笑的照片截图和文字说明: 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情绪 稳定	事故现场、满面 笑容	“丝毫不尊重死 者”
8月26日 21:00	网友@作家天佑——发微 博,被大量转发	人肉结果:此人是陕西省安监 局长杨达才	安监局长	冷漠的官员
8月26日 深夜	“@渤海论坛官博”编辑 发微博	5张不同款式的戴表图	表(时间工具)	官员爱好/身份 象征
8月27日 下午	网友“@花总丢了金箍 棒”和孙多菲的微博	对5块表的鉴定结果	名表(良好品质)	财富象征/合法性 质疑
8月29日 晚上	新浪微访谈	杨达才回应网友和解释:笑是 让基层同志放松;表是用10 年收入购买	笑、表(具有 合理性)	合理性质疑
8月29日 晚上	网友“猪头懦夫司机”、 网友“@花总丢了金箍 棒”的微博	新抛出6张杨达才戴表照,证 明杨不止5块表	表还有很多	杨达才在说谎
9月1日 下午	主流媒体报道	大学生刘艳峰申请公开杨 2011年工资	工资	比较收入和消费
9月5日 晚上	网友“晨曦微播”微博	贴出杨眼镜照片,指其价值超 10万	眼镜	腐败质疑又一证据
9月5日 晚上	网友“延庆老农”微博	右手手镯之外,还拥有各种皮 带,一身是宝	手镯,皮带	更多的质疑和物证
9月21日	主流媒体报道	杨达才被撤职	……	定性和定论
其后	网络歌曲,网络游戏……	歌曲《局长的笑,局长的 表》,安卓游戏《杨达才教你 戴手表》……	笑,表	否定、讽刺、戏谑

三、作为意义生产单位的符号：对社会关系的审视和建构

符号意义生产的背后,是对社会关系的输出、审视和重新建构。这一过程,表面上看是媒体和网民在符号使用权上的争夺,深层实质却是以符号为手段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和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调整。

(一) 谁在主导符号意义的生产——事件传播的媒介选择及其传播互动

杨德才事件的传播由网络发难，其后传统媒体相继介入，形成全国范围的媒体联动和舆论合围，其符号化传播的倾向与传播主体的媒介选择和互动具有密切关系。其中，网络媒介占据了符号主导者地位。这从自媒体的微博和大众媒体的介入时间、参与数量和传播走势上可见一斑^[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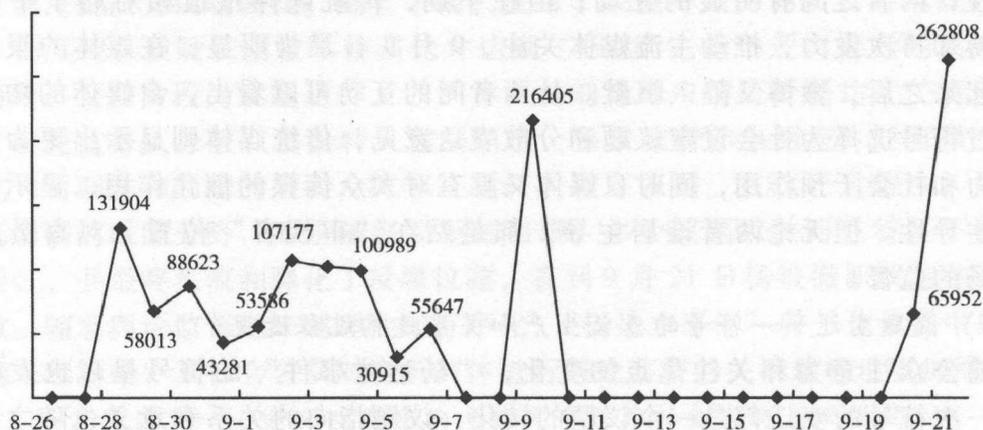


图1 “杨德才事件”微博传播日变化趋势图 (单位: 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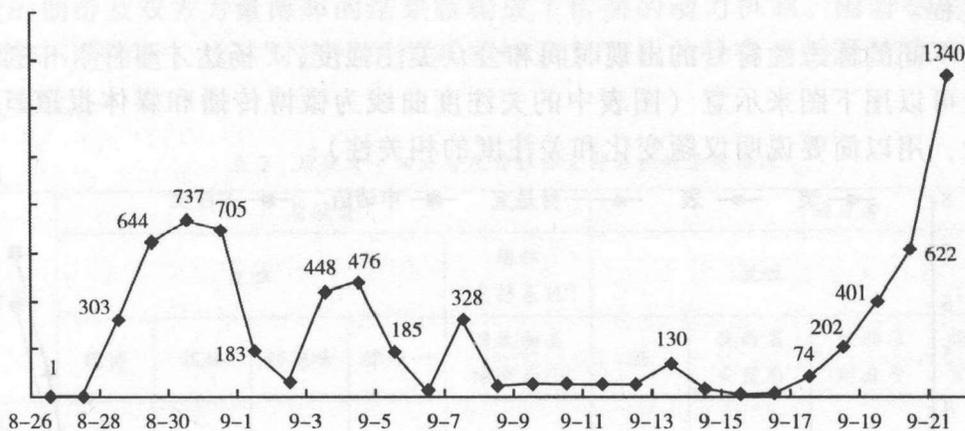


图2 “杨德才事件”媒体报道日变化趋势图 (单位: 篇数)

对这两个图表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 (1) 从议题出现时间和早期爆发看, 微博先行, 自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和激发传统媒体报道的作用。(2) 传统媒体对事件的关注相对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 后期的报道传统媒体更为积极主动, 随着“保钓”议题升级和“杨德才事件”淡出公众视野, 微博在2012年9月10日至9月19日之间有一个相对的沉默期; 最后一个传播高峰的开始, 传统媒体早于微博, 2012年9月

17日,《钱江晚报》刊文《局长天天在正常上班》,使得一度趋于平静的舆情再次掀起高潮——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传统媒体的持续关注加速了最终结果的到来,可见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更大。(3) 微博和媒体的报道同步之中又有差异:两者前期都经历了三个波谷,在验证8月29日质疑“名表”、9月1日大学生申请公开杨达才收入、9月5日发现杨达才眼镜售价13万多元等事件中,微博传播和传统媒体报道具有同步性,两者之间有明显的互动;但在中期,传统媒体报道相对趋于平缓 and 沉默,微博却再次发力,推动主流媒体关注,9月9日最为明显;在媒体的报道热情被激发起来之后,微博又陷入沉默。从两者间的互动可以看出,自媒体的功用更多在于通过符号选择为社会设定议题和分散表达意见,传统媒体则显示出更为强大的符号权力和社会干预作用,同时自媒体又具有对大众传媒的催化作用,显示出较强的议题主导性。但无论两者谁居主导,都是站在“审视者”位置上对官员展开的不同立场的监督。

(二) 议题变迁——符号的意义生产和关系建构过程透视

跟随公众注意力和关注焦点的变化,“杨达才事件”的符号呈现也发生着变化。每一次符号的变迁都是一个议题的转化,议题指向的关系和意义也随之变得复杂和深入。“杨达才事件”从出现到解决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不同社会力量间以符号为工具,通过对抗式的符号生产和解读、符号权的争夺进行意义确立和关系调整的博弈过程。

根据不同的标志性符号的出现时间和公众关注强度,“杨达才事件”中符号和议题的变迁可以用下图来示意(图表中的关注度曲线为微博传播和媒体报道日变化趋势的综合,用以简要说明议题变化和关注度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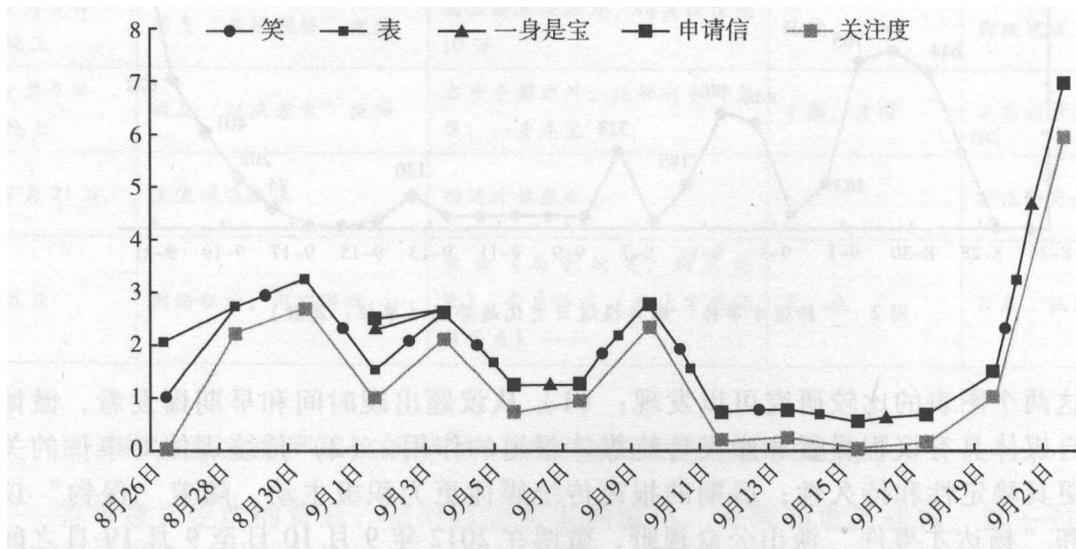


图3 “杨达才事件”传播议题变化示意图

从图示中可以看出,每一次新的符号的出现都会引起议题的迁移和公众关注度的变化:第一阶段为议题设立,表现为个人微博对“笑”的质疑(8月26日),随着杨达才8月29日在新浪微访谈中的回应和解释而迅速弱化,蜕变为新议题的引子和背景;第二阶段议题转化(时间上紧随议题设立,相差只有几个小时),从对“笑”的质疑转化为对“表”的质疑,主题也从人文情怀的批评转化为质疑官员腐败;第三阶段为议题强化,随着手镯、皮带、眼镜等新的物质符号出现和“一身是宝”的发现,质疑议题被不断强化并达到“极点”,基于逻辑推断的腐败结论也渐渐清晰;第四阶段为议题延伸,以9月1日刘艳峰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的信件为标志,舆论监督从分散、自发转入程序轨道,要求政府作出回应,对官员个人的质疑转化为对群体和制度的质询,符号议题转入程序议题。在这一过程中,议题的变迁并无明确的时间分野,而是随新议题的出现,多个议题以共时性特征不断互动并相互验证,并最终汇流和强化了反腐议题,直到9月21日杨被撤职议题才开始弱化和消散。随着舆论监督越来越理性和有序化,“杨达才事件”符号化传播中的意义呈现也越来越清晰,其社会公众对官员群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关系建构也更加明确。

(三) 官民博弈——意义生产中的主体关系及其社会支持系统变迁

当物质符号成为“证据”和讲述方式、“质疑”和“求证”成为杨达才问题的关键时,质疑者和回应者(隐喻“民”和“官”)就构成了这一关系的两个主体,对结论的期待及双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就构成了传播的动力机制。随着杨达才事件关注议题的不断演进,这一对抗性的关系主体及其背后的社会支持系统也在不断发生着力量变化。

表2 质疑者-回应者及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呈现情况

议题阶段	质疑者					回应者			
	显性				隐性 (支持系统)	显性			隐性 (支持系统)
	微博	媒体	刘艳峰	律师…	网民和其他受众…	杨	陕西省 安监局	陕西省 财政厅	杨亲友、其他 官员、网民…
出现	有								有
转化	有	有			有	有			
强化	有	有			有				
延伸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消散	有	有			有				

从表中可以看出,“质疑者”和“回应者”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其社会支持系统的活跃程度也不一样,双方呈现出多对一的“围观”态势。如果说前期还有“质询”和“抗辩”,那么,随着“质疑”力量的不断增加,“回应者”不断萎缩,

事件传播走向单向度、具有暴力倾向和戏谑性的符号宣示。这一结果的出现，首要原因是“回应者”自身的“尴尬”和不合法。在普遍的涉官公共事件回应中，官方抗辩失败的根源在于官员本身的官德败坏、权力的傲慢颀预以及官僚机器封闭运作的积习，本身有问题已置官方于尴尬，缺乏公关意识和必要的回应技巧则加剧了问题暴露的速度和程度。这是双方关系确立的现实基础。此外，“回应者”的萎缩还与双方博弈过程中“回应者”被不断瓦解和摧毁有关：任何具有“帮腔”嫌疑的回应都会迅速遭遇网民的质疑和指责而很快噤声——首先是杨潜在的社会支持系统在网络辩论中沦为“沉默的螺旋”，然后是杨本人的辩解被证明为“说谎”，再次是对申请信做出回应的陕西省财政厅被网民视为“包庇”和消极，回应力量在公众的“合法性”质疑中被逐一瓦解和退出。这在郑州市房管局就“房妹”事件、国家能源局就刘铁男事件做出不当回应被网民质疑和批评等类似事件中得到了多次的印证——“回应”行为本身被风险化，在并不缺乏表达技巧的情况下，回应者的话语权力、符号权力因为其自身行为的合法性质疑而被不断弱化，进而陷入完全的被动之中。网络反腐从“围观”走向“围剿”，网民（公众）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合法性地位的确立获得了官民博弈中的强势地位，并激发起更为强烈的舆论监督热情。

（四）意义生产和解读——关系的确立及其能动作用

是什么构建了“质疑者”和“回应者”之间的对抗关系？是符号的意义生产和解读。正是对“微笑”、“手表”等物质符号在使用和解读过程中的差异，导致了对抗性关系的确立并推动双方力量博弈，最终形成对杨的“围剿”。这种意义对抗表现在：

双方对物质符号“所指”的理解差异。在杨达才那里，昂贵的手表、皮带、眼镜等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法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让-帕斯卡尔·达洛兹认为，政治人物为了显示自身的“卓尔不群”和优越性，“有时就需要有令人瞩目的个人形象，具有标示威望的外在符号”，而服装、饰品等“显摆声望的物品”是最能体现优越性的外在符号^[14]。从杨达才个人对手表的热爱和追逐中，可以推断，手表正是杨“显摆声望的物品”之一。而在公众那里，这些东西作为有价之物，恰恰成了比较杨收入和消费的计量指标，成了质疑和推理腐败的有力判据；它同时也是实证阶层分化和阶层生存状态差异的有力标志。正是这种没有被官员意识到的符号认知的差异导致了意义和关系的对抗，这是双方对立的前提。

网民和媒体对符号的对抗性使用。车祸和微笑、官员和死者、名表和工资、清廉和贪腐、真相和谎言，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描述，使“杨达才事件”的意义生产和解读都呈现出强烈的官民对抗色彩：1. 在议题设立中，微博曝料人对符号的选择和使用，是以其先在立场和价值判断为前提的，正是其内在的人文情怀和监督意识产生的反感和质疑，才促生了博主对“微笑”和车祸背景的不协调性、名表和有限收入不可解释性的追问及其后的微博发难；媒体在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遵循了同样的

思路。2. 在解读环节, 网民不假思索地转发和跟从也显示出其对抗立场, 在缺乏“全景式”考察的情况下就对单一、碎片化的符号做出了高度情绪化的回应和意义认同, 这些符号认同的前提是网民日常经验积累下做出的情境预设、对官员的刻板印象、基于个体价值观的合法性研判等先在的具有对抗色彩的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 值得思考的问题还在于, 意义和关系谁居于主导地位, 是意义决定了关系, 还是先在的关系影响了意义的生产和解读? 从对事件完整的过程考察看, 关系的先在作用比较明显, 网民固有的立场对符号的选择、使用, 意义生产和解读具有决定性影响, 其意义过程更多的是对关系的解读和重新确定。这也验证了周葆华在研究厦门PX事件时的发现, “民众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整体上形成了一套解释框架”^[15], 这套框架使他们对新媒体事件的解读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意义逻辑。

四、作为话语权利的符号: 对公权力的监督和调整

网络通过符号重新表述和结构了权利和权力的对抗, 官员网络符号权力的弱势地位和现实权力的强势地位乃至膨胀形成了符号使用和符号认知中与网民群体的巨大差异, 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杨达才们的“中箭落马”。完整考察“杨达才事件”的传播脉络发现: 符号化传播以公民权利表达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为基本模式, 其“对抗”式表达渗透到文本、叙事及背后的关系、意义之中, 其背后的关系对立和社会情绪才是根本原因和问题实质; 在此基础上, 网络反腐事件更多表现为呈现性危机, 并通过“危机-回应”的模式和舆论压力强迫公权力做出调整。

1. 符号对抗的背后是社会情绪值的对抗, 它构成舆论监督的情感表达机制。“杨达才事件”属于典型的“抗争性谈话”, 以悬念设置议题, 以质疑建构关系, 以对立式表达进行文本生产, 以对抗性、情绪化方式进行文本和意义的消费。在故事的背后, 是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其博弈过程, 表面看是符号权力的争夺, 包含了符号使用中的修辞技巧, 其实质却是基于利益对抗的社会对抗心理和对抗情绪, “在中国的广大网民中, 普遍存在着对正义的渴望和追求、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对贪官污吏的痛恶、对权贵的嘲讽、对沟通的渴望。这些因素有着共同的内在逻辑, 即情感逻辑……情感汹涌的网络事件, 是整个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脉络”^[16]这种群体心理和群体情绪在“杨达才事件”的新闻跟帖、论坛上都有鲜明的体现, 并在类似事件中被反复验证, 值得关注。

2. 网络反腐为一种呈现性危机和典型性危机, 媒体的最大功能是“呈现”。杨达才的腐败问题早就存在, 权力“正当性”的丧失是整个事件发生发展的基本前提, 只是因为网络媒介强大的挖掘功能使之呈现了出来, 并在情绪化表达中被凸显。因此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制造性风险”, 而是“再造性风险”, 只是把问题通过符号重新表述和重新结构化。媒介信源的多元化使信息封锁困难, 民意的强大使舆论引导

困难，公众对典型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之成为公共议题，迫使政府必须做出回应——这使政府和官员面临挑战，使执政风险增加。在全球化和新媒体语境下，媒介具有更大的能动作用，“被用来理解风险的媒介会在提供风险感受的同时，卷入对风险的生产、操纵、协商和置换”。^[17]。杨达才事件传播的符号化和网民、媒体在符号使用中牢牢掌握主动权及其“合法性”的获得，都验证了风险媒介化的可能及其功能特征。但本研究认为，媒介并不是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显影剂”，媒介虽具主观能动性，但也只是起到了“曝光”和“催化”的作用。

3. 符号权力结构的改变引起公共权力结构的调整。新媒体首先改变的是信息资源的传播和分配结构。它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金字塔式结构而转为扁平化结构，信息分配结构也从科层制转向理论上的均等。信息资源的共享使公民实现了平等的媒介近用权和知情权，甚至由于时间和技术上的“富裕”而获得比官员更多的信息优势；与信息资源结构相伴的是网络的话语权利结构的改变，普通公民获得了同等的权利表达机会，并因为“民”的数量优势而成为网络上的强势话语，拥有更大的符号权力。资源结构和话语结构的改变进而改变了我国的舆论监督体系，使舆论监督实现了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位移，监督主体也随之从新闻从业者回归于普通民众，网络舆论监督因之成为当前舆论监督最为重要的手段。以网络反腐为例，周久耕 18 天被“肉倒”，“房叔”蔡斌 15 天被停职，雷政富 63 小时被“秒杀”，单增德 12 小时被调查……从被网民关注到官员被停职调查，网络反腐成为体制外最为高效、快捷、低成本的反腐手段，网络舆论监督因此也备受民众推崇，成为当前民主政治的有机构成和特色元素。在这一过程中，符号通过“合法性审判”的手段，置权力于被“审视”的位置，不仅解构了官员原有的身份认同符号系统，而且重新定义了权力的内涵和表征，客观上推动了权力结构的变化。

不仅如此，符号传播还演化为一种流行文化，进而进行意识形态的建构，从而影响权力。在“杨达才事件”中，“表”和“笑”成了敏感的政治词汇和网络流行文化，“杨达才”也成了具有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譬如网络流行语“做官不能杨达才”；其次是符号衍生的各种文化作品，包括具有恶搞性质的网络歌曲《局长的表，局长的笑》、安卓公司开发的游戏《杨达才教你戴手表》等。诉诸游戏的这种看似娱乐的情感表达背后，渗透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对官员群体的价值批评和对权力规范的婉转期待。这种貌似温和的濡染式文化传播比稍纵即逝的事件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和更为强大的权力结构整合作用。

五、作为危机标志的符号：对反腐“顶层设计”的期待——兼作结论

在“杨达才事件”的官民博弈中，微笑、手表等符号所指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被标签化为腐败标志，成为权力危机的信号。这一符号的界定及其使用过程充满了偶然性、碎片化和符号暴力色彩，带来很多负效应。其问题呈现的个态特征

及问题解决的不彻底性引发人们对危机进行深度反思和从制度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的期待。

网络反腐事件呈现的偶然性引发公众对反腐常态化、制度化的期待。有人说，网络反腐是“隔墙扔砖头，砸着谁谁倒霉”，具有太多的偶然性。网友“燕山侠客”在个人博客《假如杨达才不微笑》中写道：如果没有杨达才的微笑，没有互联网的人肉搜索，杨达才这个有问题的官员能在我们现行的监管体制之下现出原形吗……没有强大的舆论监督机制，没有先进的反贪制度设计的保证，必然导致贪官肆无忌惮的贪腐。一次又一次的偶然反腐成功，让我们的反腐机构蒙羞，我们的反腐制度到了应该彻底检讨、认真调整设计的时候了^[18]。

网络和微博自身的缺陷使人对其反腐效能也不免担忧。魏武挥在谈到微博反腐时提出，微博自身信息可信度低、碎片化和“轻阅读”等媒介特性造成的话题难以持续和深入、易于陷入娱乐化等缺陷有可能使网络反腐变成闹剧，“个人往往多是行使评论之能，而难以长期承担对复杂事实进行深度调研的使命”^[19]。不仅如此，人肉搜索、造谣诽谤等问题更是损害着网络媒体的公信力，置网络反腐于“合法性”困境，降低网络反腐的建设性意义，符号暴力化倾向使反腐可能成为非理性的运动。“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戴表了，在公开场合很注重抽烟的牌子，还有穿着打扮的牌子，怕一不小心就被‘人肉’，搜出麻烦来”^[20]。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做客央视《新闻1+1》栏目解读两起农民工冻死事件，因面带笑容，被网友批为“冷血无情”，虽然事后当事人表示“平时的面相就是这样，做节目时未刻意注意自己的表情”却依然被网民指责^[21]。这些物质、表情符号成为舆论监督和反腐的战略突破口和网络时代的独特景观，成为政治敏感词和危机的信号，使官员“谈表色变”、“不苟言笑”，具有了奴役、控制的力量，成为不同社会阵营的斗争工具和符号暴力。

网络反腐中的符号暴力倾向可能导致两个向度的后果：一是随着网络反腐成功案例的增多，公众的反腐热情被不断激发，网络反腐被过分倚重——在一项“你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的网络调查中，74.6%的参与者选择了“网络曝光”，而选择“信访”方式的只占1.27%^[22]，在这种态势下，反腐很容易走向极端，成为一种暴力革命，无法走向理性、有序和常态化。二是官员在众多的“反面教材”和不断的教训总结中学会了“躲避”，提前做好了防范工作，隐蔽不当的符号曝光，被曝光后通过公关策略建构符号的正当性或消弭符号传播的不利影响，网络反腐因此失去符号“依据”而逐渐走向无力。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会损害网络反腐行为的正当性和效能，使网络反腐走向式微。

较早微博曝光杨达才问题和给杨达才的手表做出鉴定的著名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在论及“杨达才事件”时提出，必须重申理性价值，戴表和腐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员说谎和财产的不公开。因此，微博反腐需要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在制度上形成更为完善的反腐机制^[23]。雅虎《焦点关注》在论及

怎样捍卫官员们戴名表的权利时也提出，只有财产公开和好的制度设计，才可以保障官员们“不会因少数人的贪腐，而让官员群体被妖魔化”^[24]。作为符号的“表”，对自身符号意义的调整和回归努力，客观上也具有了催化和调整制度的作用。要防止网络反腐中的符号暴力，制度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说网络反腐是“隔墙扔砖头”，那么，这种看似偶然性现象背后一定有其必然因素。当网民以技术优势和数量优势掌控了符号系统的建构规则，当网络反腐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热衷话题并体验了“戏虐”和“狂欢”的乐趣，当利益纠纷只能通过网络偏激的符号化表达来抗争，杨达才们被砖头砸倒的概率会怎样呢？与其让官员怀抱恐惧去躲避“砖头”，不如走向制度保障，让反腐走向法治和理性，也让更多的官员获得符号使用的正当性和应有权利。就网络反腐而言，从反腐主渠道还原为体制内反腐的辅助力量，从符号暴力走向符号理性，完成从“实然”到“应然”的转身，对我国法制社会和十八大提出的“协商民主”制度的构建则有更为积极的个案意义。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扩音效应及其生成机制：网络环境下社会性突发事件传播规律研究”（编号：10YJA860028）的阶段成果。

作者：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

注释

- [1] 喻国明：《新媒体促进社会变革》，腾讯教育 <http://edu.qq.com/a/20121210/000295.htm>，2012年12月13日。
- [2] [美]阿瑟·伯格：《媒介分析技巧》（第三版），李德刚、何玉、董洁、周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 [3] [美]阿瑟·伯格：《媒介分析技巧》（第三版），李德刚、何玉、董洁、周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 [4] [美]约翰·迪利：《符号学基础》，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 [5] Saussure, F. de.,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by W. Baski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 [6] 陈阳：《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 [7] [美]阿瑟·伯格：《媒介分析技巧》（第三版），李德刚、何玉、董洁、周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 [8] 赵毅衡：《符号学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2期。
- [9] 李红、董天策：《符号学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新路径》，《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 [10] 李恩来：《人性的焦点与圆周——卡西尔符号与文化哲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11] 杜积西、严小芳：《舆情事件的符号化传播及其存在的问题》，《东南传播》2012年第

- 6期。
- [12] 资料来源：林珊珊、李玲利：《“搜索”杨德才》，《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1期；《“表哥”杨德才事件全回顾》，新华网，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2-09/24/c_113183935.htm；侯文昌：《27天：“微笑表哥”落马舆情还原》，《检察日报》2012年9月25日等。
- [13] 侯文昌：《27天：“微笑表哥”落马舆情还原》，《检察日报》2012年9月25日。
- [14] 让-帕斯卡尔·达洛兹、李存娜：《政治代表如何赢得合法性：一种符号学研究方法》，《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3期。
- [15] 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 [16] 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 [17] 全燕、申凡：《媒介化生存下“风险社会”的重构与反思》，《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8期。
- [18] 消息来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2108aa01015o5r.html，2012年12月24日。
- [19] 魏武挥：《微博替代不了媒体改革》，转引自艾瑞网，<http://column.iresearch.cn/u/weiwuhui/630234.shtml>。
- [20] 李妍：《微博反腐理性回归与顶层设计》，《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48期。
- [21] 《社科院教授微笑解读农民工冻死 笑评门引公众热议》，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n/201212/t20121217_2721312.htm，2012年12月17日。
- [22] 《咋看待网络这柄被认为是反腐利器的“双刃剑”》，新华网，http://www.qh.xinhuanet.com/zwpd/2013-01/17/c_114399146_3.htm，2013年1月17日。
- [23] 李妍：《微博反腐理性回归与顶层设计》，《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48期。
- [24] 人人斑竹：《如何保障官员戴名表的权利》，<http://www.banzhu.co/article/1749099>，2012年12月10日。

of the statu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der and receiver, and the relation with other social power institutions. Third, news communicators take advantage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technology that they have mastered to produce power.

42 A Study on Network Anti-corruption's Logic of Symbo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Function in Social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 Dacai Event

· *Zhang Shuhua*

As a tool of social science, semiotics has an explanatory power for network anti-corruptions phenomenon. Afte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Yang Dacai event,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network anti-corruption events has symbo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As a tool for expression, the symbol highlights social issues and sets a public agenda for society. As a production unit of significance, the symbo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amining and construct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As a discourse right, symbols not only set social norms but also adjust social power structures by lawfulness evaluation. As a crisis index, the symbol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systematization of anti-corruption events, urging network anti-corruption actions to be rational and mature.

56 Mainstream Network Media's Instantaneous Communication Network Spatial Structure and Its Properties

· *Tian Yilin*

Based on the "Beijing 721 storm" incident, using the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his research studies mainstream online media's network topology and media node in the network and their positions and relationships formed in the information instantaneous propagation in emergenc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stant Spread Network (ISN) has a scale-free and small world and high clustering coefficient. With centrality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central media like People's Daily Online are the core of ISN. This research also make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instantaneous propagation.

70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egulatory Frameworks Under Media Convergence

· *Xiao Zanjun*

Regulatory frameworks for telecommunications,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publishing and other industries need to be suited to the converging environment. One dilemma faced by the conventional vertical regulation that artificially separates communications-related services and industries from each other is its clash with the layered technical structure and the horizontal layers framework of industry.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is problem can be solved by formulating a horizontal layered model of regulation. However, when applying models of regulatory framework, regulators find themselves be challenged to address issues of being technically neutral, creating conditions that facilitate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stimulating new forms of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ng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Regulatory frameworks need to be adapted to the trend of dynamic regulation, This article hence proposes to adopt a less rigid horizontal layered model of framework at this period of time, and later to establish a long term regulatory mechanism that mitigates effects of regulatory framework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hift from industrial regulation to competitive regulation.